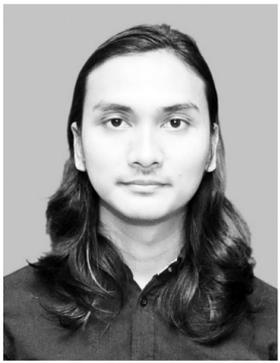


印尼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



菲迪卡 (Viridika Rizky Utama)

历史与现实的挑战

在动态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印尼正处于关键时刻。以历史武装外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在亚非会议(KAA)和积极参与东盟,我们坚持自由、积极参与的原则参与全球事务。始终致力于在国际上保持关系的独立性和平衡,印尼现在面临着新的动态。

美国驻印尼大使近期对繁荣正义党的访问,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巴斯维丹的看法,因为他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及其经常被视为与佐科·维多多总统态度对立的党(PKS),成为支持阿尼斯为总统候选人的政党之一。然而,另一方面,佐科时代与中国互动的增加,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动态。

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大国影响突出。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让人想起

“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并常常导致直接冲突。对于印尼这样的国家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驾驭这些不同的力量,确保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而又不会过于依赖或屈从于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动态不仅仅是东方或西方之间的选择,而且对它们的经济、文化和主权有着深刻的影响。

传承万隆精神的精髓

所谓万隆精神,乃是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KAA)的精髓。这种精神象征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并呼吁这些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受新殖民主义的影响。

这反映了我们不卷入全球超级大国权力斗争的历史承诺。万隆会议的遗产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该理论强调不结盟、相互尊重以及合作而非统治和分裂的重要性。

从这些原则中得到启示,需要消除阿尼斯“太美国化”的看法。实际上,11月5日阿尼斯出席雅加达大规模群众集会,从其声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相悖的。外交参与或国际经验不应与忠诚相混淆。领导人有责任与所有主要国家接触,确保接触符合国家利益。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大国可能导致政策倾斜、潜在的经济依赖和外交可操作性的降低。

虽然从务实的角度可以更好地了解阿尼斯的立场,但他像所有印尼领导人一样,必须确保印尼与美国和中国的接触体现出中间道路。这不是中立的问题,而

是主动参与的问题。每一种关系都必须植根于对印度尼西亚文化、经济和政治有利的方面。

过于偏向美国或中国也会带来自身的陷阱。对美国过多的承诺可能会疏远有价值的亚洲伙伴,而过度转向中国可能会造成经济依赖和战略脆弱性。在这里,万隆精神就像一座灯塔,它提醒我们,与处于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国家团结一致、培育基于互利而不是权力动态的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决定必须基于原则,而不是基于权力斗争。

将国际关系理论纳入这一论述将增加其深度。强调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可能表明与大国结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强调观念、信仰和身份的建构主义观点更符合万隆精神。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文化和观念因素塑造国家行为。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参与必须反映其独特的历史和愿望,而不仅仅是对权力动态的反应。

寻求平衡与独立自主

平衡的态度不仅可以防止政治纠葛,也可以为综合利益铺平道路。从经济上讲,这确保了贸易伙伴关系多元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潜在的全球衰退或贸易战的影响。在文化上,它鼓励思想交流,促进创新和相互理解。通过有效地走这条道路,印度尼西亚可以充分利用东西方的机遇。

从独立的角度进行批评,这种言论的本质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印尼。阿尼斯和他的前任一样,有责任在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世界中维护印尼利益的长期原则。万隆精神与国际关系理论交织在一

起,为评估、批评和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视角。

深思之下,我们不能忽视印尼在全球地缘政治大版图上的战略重要性。我国是一个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国家,历史上一直是地理、文化和外交方面的纽带和桥梁。基本上,我们是多样性中和谐共存的证明。

因此,我们的全球参与必须反映这种精神。我们既不是完全东方的,也不是完全西方的。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印度尼西亚,融合了丰富的传统、充满活力的现代性和开放精神。当公众看到像阿尼斯这样的领导人倾向于某个特定的超级大国时,这会引发担忧,不是因为所涉及的特定国家,而是因为平衡原则可能受到侵蚀。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等强国外交”在这里变得有意义。印尼等中等强国的实力可能不如超级大国,但具有重要的地区影响力,在斡旋和促进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发挥这一作用,印尼可以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安全等问题而奋斗。

然而,要有效发挥这一作用,需要内部凝聚力和明确的外交政策愿景。阿尼斯在其领导下必须确保国内政策符合国际承诺。尽管万隆精神是一项指导原则,但必须重新解释它以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不再只是冷战背景下的不干涉,而是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叙事。

此外,从研究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必须强调国家利益必须始终凌驾于个人政治愿望之上。尽管领导人换届,但深深植根于

我们民族灵魂的万隆精神等原则将继续存在。对阿尼斯和其他领导人的批评必须来自建设性的审议,而不是党派政治。目的是确保我国的外交政策保持弹性、适应性并符合其基本精神。

区域参与:扮演好东盟的主角

在印尼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全景中,中美动态的主导叙述只是一个维度。我国与邻国和其他重要区域参与者的复杂关系同样重要。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国,印尼处于东盟集体结构的中心,倡导以协商和共识为优先的“东盟方式”,特别是在南海争端等敏感问题上。

这一区域的角色与印尼同印度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相一致,这种关系现在因印太地区安全、反恐和经济增长的共同愿景而得到加强。两国古老的海洋联系和文明化交流已转变为现代伙伴关系,印度的“萨加尔”倡议与印尼的海洋轴心政策相契合。所谓“萨加尔”即2015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在出访毛里求斯时,提出了名为“萨加尔”——SAGAR,印地语意为“海洋”,莫迪将其解释为英文“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意为“为本地区所有人的安全与增长”的印度洋战略。

与此同时,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接近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带来了另一层复杂性。尽管与澳大利亚的历史关系有起有落,但战略利益的相互承认促进了基于反恐、海上安全和贸易等共同关切的伙伴关系。

与东盟、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凸显了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多面性。这是一场不限于大国的舞蹈,而

是延伸到充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舞台,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求不同的参与。通过编织这条共同线索,印尼重申了其作为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重要且平衡的参与者的地位。

让万隆精神再现于印尼的世界舞台,印尼不仅必须对全球流动做出反应,而且必须积极塑造它们,以便能够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发展。这需要外交技巧、战略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原则坚定不移的承诺。这样,我们不仅是正在展开的全球故事的观察者,也是活跃的编剧,确保印尼的故事以其丰富的历史和充满希望的未来继续在世界舞台上闪耀。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动态中,印尼以其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战略地位,必须确保其优雅、智慧和清晰地进行。目前围绕阿尼斯的外交政策倾向展开的讨论(以《万隆宣言》等历史原则为基础)不仅仅是一场短暂的政治辩论。这反映了我们在全球舞台上定义和阐明我们的国家身份的持续历程。

21世纪的挑战要求我们不仅要牢记过去的教训,还要使之适应当代现实。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维持国际关系的平衡,确保我们在与世界大国深入接触的同时始终维护我们的主权利益和价值。

万隆精神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指南针。当印尼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时,它总是可以用平衡、独立和远见的笔来书写,确保其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保持原则性和影响力。

(本文作者系印尼华人社区协会(KOMIT)国际关系部主任)

保卫祖国的战士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德迪·尤索夫 (TEDYJUSUF)

陆军

关于华人加入印尼陆军的最早数据是“一位华裔印尼国军中尉,名叫许标安(Koo Biauwan)”。《人民之光》(Pelita Rakyat)(1949年2月5日刊)报道,许标安(Koo)在梭罗家中被荷兰特工抓捕。荷兰特工在他家没收了一捆文件,其中包含屠杀荷兰人的命令。同一消息来源还报告说,陈瑞厥(Tan Swie Kwat)被荷兰部队逮捕,罪名是“通过配制药品和炸药来协助印尼国军”。可惜的是现在没有这两位后续的消息。

有些在革命时期协助共和国军队的华人,后来加入印尼国军。例如来自廖内省的郭子光(Karwanddy,即Kwee Tjoe Kwang),退休时他是印尼国军陆军中尉。由于他功绩卓著,后来被评为退伍军人(详情见本部分的《独立革命时期参与战斗的华裔》)。

继海军和空军之后,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有华人加入陆军。1959年起,陆军拥有两个学术机构:在马格朗(Magelang)的国家军事学院(Akademi Militer Nasional,简称AMN)和陆军工程学院(Akademi Zeni AD)。由于陆军需要运输和装备官,因此陆军工程学院改名为陆军技术学院(Akademi Teknik AD,简称ATEKAD),后来再次改名为国家军事工程学院(Akademi Militer Nasional Jurusan Teknik,简称Akmil Jurtek)。1964年起,工程、运输和装备专业的教学在马格朗进行。

陆军技术学院(ATEKAD)第一位华人军官是黄福金(Eddy Winardi,中文名Oey Hok Kiem)。两年后1962年,林毕禄(Pitoyo,即Liem Pit Lok)成为首位从国家军事学院(AMN)毕业的华人青年,他是骑兵。1963年,陆军技术学院有四位华人青年毕业:三位在工程团,一位在装备团。其中一位名为黄忠和(Agung Harmono,华文



亨德利·布安那·库玛亚斯 (HENDRI BUANAN KUMAYAS)

名Oei Tiong Hoo),他获得最佳工程毕业生的称号(Ginting, 2011),退休时他是准将军衔。黄忠和的同事陈忠熊(Teguh Santosa,即Tan Tiong Hiem)退休时是准将。陈忠熊退休前最后的职务是陆军参谋长策划副助理(Perencanaan Kepala Staf Angkatan Darat, 1993-1995年)(Sudrajat dan Arianto, 2014)。

国家军事学院华人员最多的时候是1965年。这一届毕业生确实很特别,因为当时印尼与马来西亚及其盟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这使得印尼国军领导层为各族青年进入国家军事学院敞开大门。据记录,有一届至少有九名华人军官校友。有趣的是,他们对加入国家军事学院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我们从其中一位校友的纪念品中看到,华族新生学员必须经历的大学新生接受的考验非常苛刻,因为有时会有很强的歧视性因素。

有一个给猴子取外号的活动,外号写在硬纸板上,挂在胸前,外号与他做出的姿势和外貌相符。轮到我对面要像猴子一样“受洗礼”,并被赐名。有趣的,他就叫我什么名字!“熊德怡(Him Tek Ji)”他再问:“你是支那人吧?”“是的。”“先跑十个圈!”于是我绕着篮球场跑了十个圈,喘着粗气。又被问到:“你是支那人吧”。我默不作声,他就打我一个耳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时冒出不想再继续在这里读书的想法,他们殴打我,无休止不停地踢我,最后有个高级军校学生制止了对我的惩罚。最后他们给我取一个“新客”(Singkek)的名字,意思是“新来的客人”,即20世纪初从中国来的华人,于是后来他们叫我“新客猴子(Monyet Singkek)”。

但是,华人员员都有很大的决心,能够克服所有困难,以优异成绩毕业。1965年的9位校友中有2位获得少尉军衔,即丹尼尔·索菲安(Daniel Sofjan,中文名Lie O.H)

和德迪·尤索夫(Tedy Jusuf,中文名熊德怡Him Tek Jie)。并没有许多人认识丹尼尔,相反德迪(Tedy)的职业生涯有据可查。德迪曾担任布拉维亚第五军区(Kodam V Brawijaya)的507步兵营的副司令、东帝汶RTP 16战斗部队的司令、雅加达西区军事指挥部0503的司令、迪波尼哥罗第四军区司令的策划助理、万鸦老圣地亚哥的131军分区司令部(Korem 131)的司令。后来他担任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委任的国会议员(1995-1999年)。后新秩序时期,德迪在华人中非常有名,因为他领导了改革时期最大的华人组织之一,印尼中华百家姓协会(Paguyuban Sosial Marga Tionghoa Indonesia,简称PSMTI)。

华人军官在陆军中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是少将,这是由国家军事学院1964年毕业的校友林凯和(Ls-kandar Kamil,即Liem Key Ho)实现的。林凯和(伊斯干达)——1941年出生于三宝垄——在法律领域的专长使他晋升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法律辅导机构主任。后来,他担任国会协理员(1993-1998年),最高法院特别刑事处副处长。附录中可以看到1960-1966年军事学院华人校友的记录,从华文名字中可以找到的共有19人。

在1965年达到顶峰之后,随着新秩序政权的崛起,被军事学院录取的华族青年人数继续下降。由于实行把中文名字改为印尼文名字的政策,可能无法继续追踪他们的后续。也有可能是他们刻意隐瞒华人身份。

但在改革时期,人们越来越开放。似乎,尽管不多,但华人青年仍然对通过军事学院(Akademi Militer, Akmil)保卫国家感兴趣。例如,2008年军事学院校友,防空炮兵亨德利·布安那·库玛亚斯(邱姓)亨德利曾承担的任务有: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防空炮兵2营,D型导弹炮台三排排长(2009-2010年),D型导弹炮台二排排长(2010-2011年),D型导弹炮台一排排长(2011-2012年),D型导弹炮台作战军官(2012-2013年),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防空炮兵2营人事科军官(2014年至今)。亨德利在谈话中提到,他的一些同事是华人,也是军事学院的校友,目前在印尼各个地区服务(2015年1月18日发给笔者的信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中国“歼10”万里飞往中东

廖省·林越

众所周知,自从在中东地区发现并开采石油后,冒出了几个“富得流油”的阿拉伯国家。它们为了保卫天然资源及国土安全,数十年来不断积极地向发达国家购买军事设备。

以色列屡次使用西方武器将阿拉伯国家打得落花流水,让大部分中东国家比较“迷信”西方武器;尤其是空军,除受制裁的伊朗外,阿拉伯国家基本是清一色的西方战机。近年来中国的导弹、无人机与火炮等武器虽然打开了市场,但军机仍无法占据一席之地。

去年,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歼-10CE战斗机约值架1亿美元,没有美国的F-15那么贵,而其利润依然相当可观,带来的后续收益也更高。战机的配备的涡扇发动机、导弹以及各种复杂的电子设备,往往只有出口国有能力修理,买家每年要花钱邀请卖方专家来维护保养。一架战机的服役期约30年,加上出口配套武器所赚到的钱,让西方军火商大赚特赚了。中国若想成为武器出口强国,就必须打开中东的军用飞机市场,从西方手中抢订单。

中国歼-10C问世多年,仍未打开中东市场,主要是中东国家盲目崇拜西方的思维作祟,仍以旧眼光看待中国战机的。想改变中东的印象,须通过实战或对抗演习作比较。歼-10C属四代半战机,采用鸭翼的三角翼布局,瞬间盘旋能力与超音速,机动性媲美西方先进战机。标配玻璃化座舱、电子战系统、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具抗干扰及锁定能力。

巴基斯坦空军去年列装歼-10CE战斗机后,邀沙特空军举行“印度河之盾-2023”演习,沙特派出了F-15战机。演习中,巴方歼-10CE负责制空权,掩护“枭龙”战机对假想敌发射制导武器。沙特F-15专门负责拦截JF-17“枭龙”,并跟歼-10CE争夺制空权。

F-15作为美国空军主

力,号称从未在空战中被击落,由它担任歼-10CE的对手,算是相当强劲的“热身赛”了。而在格斗空战环节,歼-10CE面对F-15丝毫不落下风。凭借更强的盘旋能力及具备大离轴攻击能力的霹雳-10空对空导弹,歼-10CE更容易先敌开火;在第四代近距格斗弹超强的命中率加持下,歼-10CE先敌开火,将意味着一击必杀。

从巴基斯坦空军公开的視頻看,中方已为巴基斯坦的歼-10配备了第三代的头盔显示系统(HMDS),这款头盔通常只装备于F-35、歼-20等第五代战斗机上,效果十分显著。虽然沙特与巴基斯坦均未透露空战的具体结果,但从中方高调宣布歼-10C赴中东参加航展的消息看,歼-10在演习中的表现应该是令人满意。连挑剔的巴基斯坦空军都列装了歼-10CE,还将作为主力制空战斗机,足以打消中东阿拉伯石油大户们的最后疑虑。

11月9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7架歼-10从华北启程,航行7000公里后抵达阿联酋迪拜的阿勒马克图姆机场,参加于13日举行的迪拜国际航展,这是歼-10C首次在中东实机展示。

而转场远距离飞行,无需依赖大飞机领航,说明歼-10C的航电设备更先进、更精密。《南华早报》称,中国希望借此机会,向中东推销这款先进战机。

中国歼-10C除了性能好,还有一个优势会打动中东客户,那就是中国不会附加政治条件,不像美国及英国却要受到美国管控,稍有不服,美国就拿“断供零部件”来威胁。而西方战斗机敢在中东买那么贵,很大原因是长久的市场垄断,没有其他的选项。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西方战机自然“店大欺客”,一架战机动辄卖2、3亿美元。而今中东国家有了新选择,歼-10C的航电系统、霹雳-15E导弹、头盔显示系统一样不缺,而价格更公道,中东国家不是“人傻钱多”,有

了选择,当然不愿继续被西方割韭菜。

11月13日,第18届迪拜航展在阿联酋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拉开帷幕。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应邀来到迪拜,继2017年11月后第二次亮相阿联酋,作压轴登场表演。

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以换装后的歼-10C亮眼登场,大箭队拉开六机飞行表演的序幕,密集编队低空掠过,拉出6道彩虹,向各国来宾致敬。六机筋斗、五机雁阵、四机垂直向上开花,从多机编组到单机飞行,盘旋俯冲、半滚倒转、上升转弯,队形转换灵活自如。展现出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飞机优越的机动性能,赢得现场众多好评。

迪拜航展观众法赫德说:“我在航展上看到了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印象非常深刻,技术含量很高,非常先进。”阿联酋空军机械技师伊萨·曼苏里坦言:“这是我今天看到最好的飞行表演,我想这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军事技术水平的提升。”

巴以最新冲突已有5周,以色列对加沙难民营、医院甚至学校视为打击目标,加沙成了“人间炼狱”,美日欧洲侨民都撤了,以方却不许中国公民撤离。这不排除是以色列报复之举,因中国反对美国在联大提出的巴以冲突草案,强调维护巴勒斯坦的基本权利,还谴责以方对平民轰炸的反人道主义。睡毗必报的以色列右翼故意给中国撤侨制造障碍。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早就提醒以色列:“将中国当成对手,是选错了对象!”这次阻碍中国撤侨,张军发声把话挑明,“以色列需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别太猖狂!”网民表示,对“畏威而不怀德”的以色列,歼-10C的中东行,应该有“立威”之意!

